馆藏文物承载的人文历史价值普及实践——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长征文物”为例

张瑞晨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10

摘　要：馆藏文物作为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历史价值。如何将这些价值有效传递给公众，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核心命题。本文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长征文物”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人文历史价值挖掘与普及实践中的经验与路径。研究表明，通过学术研究夯实价值阐释基础、借助展陈叙事构建价值传播体系、依托公共教育活动实现价值内化，三者协同构成了文物人文历史价值普及的有效模式。文章进一步提出优化藏品研究深度、创新叙事表达方式、拓展数字传播渠道等建议，为馆藏文物价值普及提供实践参照。

关键词：馆藏文物；人文历史价值；价值普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长征文物

引言：博物馆收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生活与精神的物质遗存。它们以实物的形态承载着前人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价值选择，构成了人文历史价值最直接的物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大量反映中国近现代历程的实物资料，其中与长征相关的文物以其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深刻的人文内涵，成为开展人文历史价值普及的优质素材。本文以这批馆藏文物为案例，分析其人文历史价值的挖掘路径与普及实践，探讨博物馆如何有效实现文物价值的社会传递，以期为同类工作提供参考。

1 馆藏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内涵与阐释维度

1.1 人文历史价值的概念界定

人文历史价值是文物价值体系的重要维度，与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列而关注重心不同。历史价值侧重文物作为事件“见证物”的客观性，人文历史价值则聚焦文物所承载的“人的故事”——器物主人的生命经历、情感状态、精神追求及人与物的深层关联。一件行军时用的马灯的历史价值在于其所属时期，人文价值则在于它曾陪伴战士走过漫长路程，灯身凹痕记录艰难时刻，灯底修补见证匮乏中的珍惜。人文历史价值的核心是“人的在场”——透过器物看见背后的人，感受其处境、理解其选择、体会其情感。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维度赋予文物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力，使其成为当代公众与过往世代之间的对话媒介。

1.2 长征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具体体现

国博馆藏长征文物涵盖文献、实物、图像等类型，其人文历史价值体现于三个层面。第一层“生存境遇的见证”——简陋炊具、磨损草鞋、缝补衣物如实记录极端条件下的生存状态，让人感受物质匮乏年代的真实处境。第二层“情感世界的留存”——家书、日记、战地速写、战友赠物承载离别、思念、牵挂等丰富情感，使历史成为有温度的人生片段而非冰冷事件序列[1]。第三层“精神境界的呈现”——自制学习材料、文艺创作、日常记录展现艰难环境中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三个层面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共同构成长征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完整谱系，为价值普及提供多层次的阐释资源。

1.3 价值普及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

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普及，理论上依托博物馆教育学的“意义建构”理念——教育的核心不是传递既定知识，而是帮助观众在与文物的对话中建构个人化意义，这恰是人文历史价值最适宜的传播方式，因其不追求标准答案而鼓励多元理解。现实层面，当代公众尤其是青年对历史的兴趣往往始于情感共鸣，文物的人文价值恰好提供这种共鸣触发点。当观众从一件文物中读出具体人物的喜怒哀乐，历史便从遥远变得切近、从抽象变得具体。情感驱动的历史认知是培养公众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的有效途径。系统开展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挖掘与普及，既是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应公众深层文化需求的必要举措。

2 国博馆藏“长征文物”的整理与价值挖掘

2.1 馆藏长征文物的主要类型与概况

国博收藏的长征相关文物数量可观、类型丰富，按物质形态分为三类。实物类包括武器、生活用具、衣物鞋帽、其他杂物等，多由亲历者或其家属捐赠，保存了

原始使用痕迹。文献类包括亲笔书信、行军日记、会议记录、宣传册页等手写或印刷文本，其中不少是首次披露的原始资料。图像类包括战地速写、地图手稿等视觉材料。这些文物来源明确、流传有序，大多附有背景说明，为价值挖掘提供了可靠信息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馆藏中相当部分文物并非出自知名人物，而是属于普通参与者——恰恰是这些“平凡之物”，承载着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历史价值。

2.2 价值挖掘的方法与过程

馆藏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挖掘是多学科协作的系统工程，核心方法可概括为“物质考据—文献互证—语境还原”三重递进。物质考据由修复与检测人员对材质、工艺、磨损痕迹进行科学分析，获取器物自身携带的物理信息，为后续阐释提供客观约束。文献互证将器物信息与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比对验证，确认归属背景与使用情境，使“物”的沉默信息获得”文”的叙事支撑。语境还原将文物放回具体历史情境与个人命运中去理解——油灯是谁在什么情况下购买的、走过哪些地方、为何保存至今——完成这种情境化复原后，文物便从“旧物”转变为“故人故事的物质化身”，研究人员据此提炼人文主题词，为展陈教育提供索引[2]。

2.3 典型文物的价值解读案例

以馆藏一件长征时期红军战士珍藏的野菜为例，可见人文历史价值挖掘的具体过程。如果不了解其背后大的历史故事，单纯只是一株简单的野菜标本。但是细细思考，就会考虑到主人是谁？它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在物资极度匮乏时，什么支撑着战士走完长征？但这些追问已打开人文阐释空间——即使在最艰难环境中，红军战士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依然拥有着强烈的信念与意志，并依靠它们战胜了种种困难。这种直指普遍人性的解读，正是人文历史价值普及的核心所在。

3 人文历史价值的普及路径与实践

3.1 展陈叙事：以“人的故事”重构观展体验

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普及，最直接的载体是展览。传统的文物陈列侧重于展示“物”本身——标注名称、年代、尺寸，辅以简要的背景说明。这种“物本位”的展陈方式虽然客观严谨，却难以唤起观众的情感参与。国博在以长征文物为主题的展陈实践中，可以尝试转向“人本位”的叙事策略——不再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文物，而是围绕“人的处境”组织展品群，引导观众带着对“人”的关注进入观看。这种展陈叙事将文物从“历史物证”转化为“人生片段”，使观众在移步换景中完成对一段集体经历的情感认知，而不是知识记忆。

3.2 教育活动：从“观看”到“对话”的深度参与

展陈解决的是“让观众看到”，教育活动解决的则是“让观众参与”。国博依托馆藏丰富的长征文物资源，设计了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文历史教育活动。我认为可以尝试组织面向中小学生的“文物会说话”课程，让学生分组选择一件文物，通过观察、提问、推测、查证四个步骤，还原文物主人的经历与心情，最后以第一人称讲述“文物的故事”。这一过程训练历史想象力与同理心——学生不必给出标准答案，但必须基于实物细节进行合理推演。面向成年观众的“重读长征日记”读书会，选取馆藏日记整理本，由研究者引导参与者逐段细读，讨论日常细节与情感变化，将宏大叙事落实为具体可感的人生体验[3]。面向家庭的“寻宝工作坊”，鼓励亲子在展厅中发现“最打动人的一件文物”，用绘画、写作或口头讲述分享各自的发现与感受。这些活动的共同点在于将文物从“被讲解的对象”转变为“对话的伙伴”——参与者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互动中完成对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个人化理解与内化。

3.3 数字传播：拓展价值普及的时空边界

文物的人文历史价值不应局限于实体展厅，数字技术为远距离传播创造了新可能。我也尝试在长征文物价值传播方面进行了专项探索，在未来的展览中一是考虑开发”文物背后”线上专栏，每期以一件文物为核心，用图文和短视频讲述其背后的人物故事，聚焦于最打动人的细节——如一封家书中的某句话、一件衣物上的修补处，以克制叙事传递深沉情感。二是在社交媒体推出“假如文物会发朋友圈”互动话题，鼓励网友为战地速写或生活器物拟写“主人的心声”，在轻松参与中体会文物的人文温度。三是建立“记忆拼图”平台，将长征沿线不同地区博物馆的同类文物进行数字化汇集，公众可跨越地理界限，对比不同文物反映出的共同生活经验与情感模式，形成对历史更立体的感知。数字传播的优势在于覆盖面与参与度，使人价值普及从“到馆才能体验”转变为“随时可以触及”，让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受众群体，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普惠化传播。

4 优化馆藏文物人文历史价值普及的路径建议

4.1 深化藏品研究，夯实价值阐释的学术根基

人文历史价值的普及不能脱离扎实的学术研究。当前部分博物馆在价值传播中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

——展陈设计精美、活动形式多样，但文物本身的深度研究不足，导致阐释内容单薄甚至出现偏差。优化普及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加大对馆藏文物尤其是“普通文物”的研究投入。建议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组织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人员对馆藏长征文物进行系统性整理与深度解读，建立每件文物的“人文档案”——不仅记录其物理信息，更梳理其背后的人物关系、流传经过和情感内涵。同时，鼓励研究人员将学术成果转化为通俗化的阐释文本，为展陈、教育、传播等各个环节提供扎实的内容支撑。只有学术根基深厚，价值普及才不会沦为空洞的说教或随意的想象。

4.2 创新叙事表达，增强传播内容的情感穿透力

文物人文历史价值的核心是“人的故事”，因此其传播方式应当遵循情感传播的规律。当前博物馆在价值传播中常见的误区是“信息过载”——试图在一件文物上附加过多的背景知识和价值判断，反而淹没了最珍贵的情感触点。优化叙事表达的关键在于“做减法”：找到每件文物最独特、最动人的那一个细节，以此为支点撬动观众的情感参与[4]。例如，不必全面介绍一位战士的生平，只展示他日记中某一天写下的一句话，并配以当天行军路线和天气状况的简单交代——这种克制的叙事反而更有力量。此外，叙事表达的创新还包括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同一件文物既可以从主人的视角讲述，也可以从其家人、战友甚至器物本身的视角展开。多视角叙事能有效避免价值传播中的单一化倾向，让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找到情感共鸣的入口。

4.3 拓展参与机制，实现从“接受”到“共创”的转变

人文历史价值的深度普及，最终要落实到公众的主动参与上。传统的价值传播模式是“博物馆阐释—公众接受”的单向路径，公众处于被动位置，难以形成深层次的价值认同。建议进一步拓展公众参与的机制与渠道，推动价值普及从“单向传播”走向“共同创造”。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记忆捐赠”平台，鼓励公众将家中与长征相关的实物或口述资料捐赠或借展给博物馆，使馆藏体系持续得到社会补充；开设“观众策展”项目，邀请不同群体利用馆藏文物资源策划自己的微型展览，表达自己对人文历史价值的理解；开展“文物与我”主题征文与短视频创作活动，引导公众将文物传递的人文精神与自身生活体验相联系，形成个性化的价值表达。当公众不再仅仅是价值的“接收者”，而是价值的“共创者”时，人文历史价值的普及才真正实现了其教育目标——让文物承载的精神进入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可以传递、可以生长的活的记忆。

结束语

文物的人文历史价值根植于个体生命经验向物质载体的沉积过程。国博以长征文物为素材的实践表明，这一价值的有效传递依赖学术研究、展陈叙事、教育项目与数字传播的协同运转，任一环节的薄弱都将影响整体成效。审视当前工作，藏品阐释的深度参差、叙事手法的趋同化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系统性不足，仍是制约普及效果的主要因素。博物馆界需在专业研究精度与传播创新能力上持续突破，构建更开放的价值共享格局。惟其如此，收藏于馆阁之中的器物方能超越时间的阻隔，成为联结不同时代人群的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1] 崔凯欣. 建构主义理论在博物馆教育中的应用：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 [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26,317(2):101-104.

[2] 李琮. 国家博物馆馆藏京汉铁路工会证章 [J]. 北京档案,2023(1):60-62.

[3] 巩庆华. 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角色: 博物馆公众参与与文化传播 [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280(13):102-105.

[4] 乔娇.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公众教育与服务——以南越王博物院为例 [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3(3):18-23.